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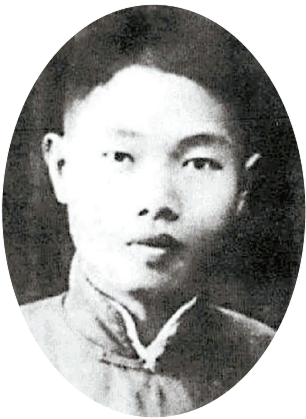
新民旅游



徐懋庸在花园坊几易其居

徐懋庸,作家、翻译家,原名徐茂荣,笔名众多,如致立、高平等,精通英、俄、法、日等语言,译笔畅达,写作以杂文见长,活跃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。

徐懋庸早年住在花园坊(今瑞金二路129弄),先后在103号、106号、107号居住过,直到1938年离沪奔赴延安。



翻译海外进步书籍

徐懋庸出生于浙江上虞下管镇的一个贫苦家庭,成长时目睹了镇内地主乡绅与中农贫农的巨大差距。那时,徐懋庸家属于“润山堂”一支,都是勤劳节俭的中农,其父起早摸黑地做做面粉用的纱筛维持生计。徐懋庸不到10岁,就在小学老师的领导下参与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集会活动。

1926年,15岁的徐懋庸在家乡的民强小学做教员,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受党委派来上虞活动的叶天底,而后参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,并担任秘密刊物《石榴》的编辑。次年大革命失败,徐懋庸被反动派通缉,不得不逃亡至上海。

来到上海后,徐懋庸为谋生发愁之际,在报纸上看到国立劳动大学的招生广告。该校不仅不收学费,还提供膳宿,他以“余致力”为化名赴考,并顺利入学。在三年的学习中,徐懋庸为了阅读外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,自学英语、法语,还向同学请教日文,始终坚定地追求成为一名革命的文化工作者。

1930年,徐懋庸回到浙江临海回浦中学教书。三年后,他辞去教职,再度进入上海,以翻译日法进步书籍为业,同时不断寻求进入革命文化界的机会。

起初,徐懋庸屡屡碰壁,曾向黎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投稿未果。幸运的是,他在向《东方杂志》投稿后引起了胡愈之的关注,在其帮助下为生活书局译成日本山川均的《社会主义讲话》,自此在上海立足。

译书期间,徐懋庸由钟敬之牵线,搬进花园坊的一个亭子间。同年,原住103号《社会与教育》编辑部三楼的黄源夫妇搬走后,徐懋庸便携家住进此处。1934年春,徐懋庸加入

左翼作家联盟,他又从103号搬到106号2楼,与当时住在107号的曹聚仁毗邻而居。

与曹聚仁无话不谈

花园坊位于黄浦区瑞金二路,北邻复兴中路,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建成,脱胎于后期石库门里弄,为新式里弄住宅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,花园坊名人云集,既有作家如徐懋庸、曹聚仁、黄源等人居住于此,又有茶叶专家吴觉农、企业家董竹君、历史学家卫聚贤、音乐宗师黄自等人在此寓居。

106号与107号楼紧挨在一起,位于花园坊南部,均为三层红砖洋房。一楼设开敞式的小庭园,二楼阳台挑出,有黑色铁艺扶栏,二、三楼的窗户框采用暗红色,与砖红色外墙相搭配,更显质感。在花园坊106号时,徐懋庸与曹聚仁贴邻相处,据说他常从自家的阳台一脚跨到曹家的阳台,然后两人便倾谈至深夜。107号楼的三楼是曹聚仁之前花了二百元买下的,原租客走后,他便邀请徐懋庸夫妇搬到曹家楼上居住。于是,徐懋庸便成了他的房客,二人相知更深,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。

徐懋庸颇受曹聚仁照顾,曹聚仁时任大学教授,收入稳定,而徐懋庸全靠稿费收入,经济状况不稳定,房租交得全无准期,但是曹聚仁并不在意。据曹聚仁回忆,二人有一个共同的嗜好,就是喜欢看绍兴戏,还都是吴昌顺、筱凤彩的戏迷。

徐懋庸在107号楼居住了三年之久。1936年之后,因“左联”解散和“两个口号”等纠纷,徐懋庸与鲁迅产生隔阂。1938年,他离开上海前往延安,希冀弄清当时争论的是非曲直。

文 沈琦华 实习生 范久清 图 金晶

科学会堂

地址:南昌路47号

科学会堂1号楼始建于1904年,经历数次改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,1994年被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,201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科学会堂整座建筑的门洞,类型多样,保存完整。北立面入口底部为半圆拱形门洞并饰以贝壳状雕饰,中部为倒圆角矩形窗,顶部有瓶式栏杆及山花。沿木质楼梯拾级而上,可见由彩绘玻璃镶嵌的弧形花窗,这面彩绘玻璃于1918年由土山湾美术工场制作。

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

地址:南昌路100弄2号

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(《新青年》编辑部)旧址,建于1911年。1915年9月,陈独秀在上海嵩山路附近创办的月刊,次年自第二卷改名为《新青年》。

1920年初,《新青年》编辑部随陈独秀迁至老渔阳里2号(今南昌路100弄2号)。楼上厢房是陈独秀的卧室,楼下为《新青年》编辑部。这里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,《新青年》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,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。

周边漫步



扫二维码 看视频

申景如画

寺前村古文化遗址出土文物精美

寺前村古文化遗址位于青浦县大盈乡寺前村,因村后有慧日寺而得名。遗址在1966年取土填浜、扩大耕地面积时被发现,1977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今上海中部偏西,有一条西北—东南走向的“冈身”地带,由大海量泥沙和贝壳残骸堆积起来,是一条距今四千年的上海的海岸遗迹。寺

前村遗址位于这条冈身的西侧,由于受冈身保护,地势高爽,故成为古代上海先民生活的优良场所。

在1966年的发掘中,发现遗址有三个文化堆积层:上为灰黑土层,

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何印纹陶文化,出土器物有印纹硬陶坛、罐及原始瓷碗和杯等。中为黄褐土层,是周代几何印纹陶文化亭林类型,出土器物有带柄石刀、器足外撇的鼎、浅腹三足

盘、敞口深腹高圈足簋、高颈折肩尊等。下为灰土层,出土了具有崧泽文化特点的多节把镂孔豆、镂孔双腹花瓣足罐、筒形花瓣足杯,以及良渚文化的贯耳壶、扁方足鼎和长方形穿孔

石斧、石镰等。1990年11月,上海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8口古井、5座墓葬、6个灰坑和大量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遗迹,出土大量古代遗物。发掘表明,寺前村遗址文化堆积主要有距今五千年前的崧泽文化、距今四千年前的良渚文化、距今两三千年的西周至战国时期和距今一千年的宋元时期四个阶段。 夏菁岑